

东王関子鈔版研究



施继龙 李修松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东至关子钞版研究

施继龙 李修松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至关子钞版研究/施继龙,李修松著. —合肥:安徽
大学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7-81110-526-1

I. 东… II. ①施…②李… III. 纸币—古钱(考古)—
研究—东至县—宋代 IV. K875.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037 号

封面题签 黄锡全

东至关子钞版研究

施继龙 李修松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7145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	ahdxchps@mail. hf. ah. cn	开 本	710×1000 1/16
责任编辑	张朝胜 杨国平	印 张	10.7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526-1

定价 30.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行在權貨務對椿金銀見錢關子”版 (22.70 × 15.06cm)



“準勅”版 (19.07 × 13.48cm)



“景定伍年頒行”版
(15.04 × 5.61cm)



“宝瓶”版
(16.48 × 7.43cm)



国用见钱关子之印
(6.10 × 5.92cm)



行在權貨務金銀見錢关子库印
(5.74 × 5.65cm)



金银见钱关子监造檢察之印
(5.64 × 5.55cm)



□□□见钱关子合同印
(5.56 × 4.13cm)

序

南宋关子版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戴志强

有幸先读施继龙、李修松合著的《东至关子钞版研究》书稿，深感这是一部关于南宋关子版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这部书的上篇，在分别介绍东至关子版一组八件的实物遗存情况和制作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一步的研究，包括对其制造、工艺和材质的分析研究；根据遗存的实物，模拟实验了南宋关子的印制工艺和技术，并和“千斯仓”版、“行在会子库”版等其他现存的两宋纸币钞版进行了比较研究；还对其真伪、性质、用途等相关问题开展了分析和探讨。下篇则系统介绍了东至关子版发现、收集和鉴定的全部过程，客观、全面地汇集并介绍了东至关子版发现以来，各界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这部书没有华丽之词，没有取巧之意，确是实实在在地汇集了二十余年来有关南宋关子版研究的所有资料，揭示了有关这一课题研究的最新信息，从而为南宋纸币及其印版的研究、为两宋货币史、印刷史的研究，造就了一块可以信赖的基石。

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着东至发现的这套关子版的信息，因为它对两宋纸币研究、对我国早期纸币历史的研究至关重要。1993年12月，我和姚朔民、周卫荣一起，曾经专程到东至考察过这套关子版，在两天的考察过程中，我们相互交流过各自的看法，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后来朔民和卫荣分别在《中国钱币》上发表了专题文章。对于东至关子版的真伪鉴定及其相关学术问题的讨论，安徽省钱币学会、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安徽省文化厅、文物局始终给予高度重视。2004年10月，由中国钱币学会货币史专业委员会和安徽省钱币学会联合组织召开的两宋纸币研讨会在池州召开，其重点议题实际上还是东至关子版。今年7月，应安徽省文物局的邀请，我和黄锡全、翦宁同行，又一次专程到了东至，又一次实地考察了实物，不过这一次是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的身份来参加“东至关子钞版鉴定会”的，是要给东至关子版一

个说法。所以我知道此行的责任,行前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实物鉴定的时候,除了复核上次考察时所得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否确立外,同时也考核了别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依据,重点考察了几个关键部位,作为得出结论的支撑。经过认真鉴定之后,我的观点是:东至发现的这套关子版应该是“南宋末年私印关子铅版”,属国家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这个意见,经过商议,也得到了锡全和翦宁的赞同,于是成为这次鉴定会的最终审定意见。

所谓“私印”关子版,就是说它不是政府正式制造的关子印版,而是由当时民间私人制作的,其目的是为了伪造关子。理由是:

一、这套关子版要印制的关子,全称是“行在榷货务对榷金银见钱关子”(见主版),但此版将其中的关键词“对榷”的“榷”字,错刻成椿树的“椿”字,而且是错在主版最醒目的大字标题名称上,这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低级错误,政府正式制造的关子版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伪造者不知道“对榷”两字的真实含义,依样画葫芦时,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二、印章版的文字采用九叠篆书体,九叠篆是一种复杂难读的书体,民间并不使用,宋朝的官印(政府用印)采用这种书体,目的是为了防伪。今所见印章版的篆文书法,只是形似,却有几处错误,这正好说明篆刻者并不精通九叠篆的篆文书法,政府正式制造的印版自然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三、“见钱关子合同印”,形似一块残版,像是残缺了印章的前面几个字。但仔细察看实物,此印版并非后来残损,而是伪刻者的有意所为,全印的三行字,删去了第一行,完整地保留了后面的两行字。这一作为,恰恰暴露了伪作的破绽,因为合同印是骑缝印,它应该是加印在“关子”和“存根”的交接处,关子和存根切割开以后,留在关子上的合同印,只能见到其中的一部分,但伪造的关子不需要存根,所以只刻制三分之二的印体就完全够用了,伪造者在作伪时更为实用、更为方便。

四、此套关子版系由铅板刻制。文献记载以及遗存所见其他宋代钞版均为铜质印版,由青铜浇铸,版体较厚,此套关子版则为铅板刻制,有明显的雕刻痕迹,版体轻薄。铅质容易磨损,不利于大批量印制使用,所以历代政府均不采用铅质作为钞版的材料。对于伪造者而言,则铅板质地较软,容易刻制作伪。

五、此套关子版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特别是用于固定印版的小穿孔,有自然磨损痕迹。

那么,这套关子版既然是伪版,为何还可以定成国家馆藏“一级文物”呢?关键在于它是南宋的遗物。理由是:

一、这套关子版的版式布局、行文口气、文字书体、制作特征,以及印章所涉及的主管部门等等,均符合宋制。行文中虽有个别地方和史书的记载不完全相

同,但没有明显的抵牾。

二、这套关子版的制作,专业性极强,没有见过关子原件的人,很难设想会有如此高明的学识和作为。假若真是后人的伪作,那么作伪者本身便是宋代纸币研究的专家,也就不会再犯把“椿”字错刻成“椿”字的低级错误。

三、这套关子版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痕迹自然,不属于有意做旧,说明它的确使用过,印过关子。而后代的作伪者是伪造钞版、伪造文物,其目的不是要伪造假钞、伪造关子。即使是印制假关子,目的也是为了伪造文物,而不是大量使用假关子,所以印一张、印几张便可,根本没有必要去大量印刷,否则只会自我暴露,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既然是大量印过关子,它就只能是南宋的遗物。

四、这套关子版锈蚀严重,但不是有意新做的假锈,锈色自然,具有历史的沧桑。

综上所述,这套关子版应是南宋遗物。到目前为止,两宋钞版一共只发现了三套。一是“千斯仓”版,只存有主版一块,铜质。以前认为是北宋“交子”版,后来有说是“钱引”版,最新的观点认为是北宋末年的崇宁小钞版。二是“行在会子库”版,也只存有主版一块,铜质。应是南宋“会子”的印版。三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套关子版,共有八块印版,包括主版两块、辅版两块、印章版四块,均为铅质。这套版虽是私版,但它保存最为齐全,是目前遗存的唯一的一套南宋关子版,即使它是当时的伪版,也是目前为止可以反映南宋“关子”真实情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因此它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绝不可以低估,定为一级文物,当之无愧。

确定这套关子版是南宋遗物,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基础工作,是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至于它的性质、用途,是官版还是私版,乃至更深层的学术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研究和讨论。因此,我为继龙、修松先生的这一课题研究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祝愿他们的事业成功,祝愿中国的钱币学、纸币史,以及印刷史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二〇〇八年八月廿八日写于北京

目 录

序	戴志强 1
---------	-------

前言	1
----------	---

上篇 关子钞版研究

一、宋代钞版研究价值探析	17
二、宋代最后一种纸币——关子考述	22
三、关子钞版形制、图案、文字考	26
四、关子钞版的制版技术	49
五、关子钞版的制版材料	54
六、关子钞版的腐蚀产物分析与保护方法研究	58
七、关子之前的三种纸币——交子、钱引、会子的印刷工艺	63
八、关子钞版的印刷工艺及其价值	70
九、关子钞版排版方式研究	74
十、关子钞版与套印工作台的复制	86
十一、关子钞版套印模拟实验	90
十二、关子钞版与千斯仓版、行在会子库版的比较研究	94
十三、关子钞版真伪、性质、用途和价值的再研究	102

下篇 关子钞版的发现、流传与研究历程

十四、关子钞版的发现	109
十五、关子钞版“问题”的由来、发展和解决	114
十六、关子钞版的研究历程	121
十七、前人研究成果综述	127
附录 关子钞版研究文章目录(1984—2008)	159
后记	165

前言

中国是公认的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益州(今四川成都地区)流通的铁钱既笨重又价值低廉,无法满足日益发达的市场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市场上急需一种既能大量复制,又方便携带的货币。考古资料表明,中国至少在西汉时已发明造纸术^[1]。到唐代,印刷术已得到广泛应用。经过长期的发展,北宋时期造纸和印刷技术已十分成熟且应用广泛。在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与刺激下,便产生了造纸术、印刷术和货币完美结合的产物——纸币。《文献通考·钱币考》载:“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起初交子是由民间商户自主发行的,即所谓私交子。天圣元年(1023年)宋廷“始置益州交子务”^[2],将交子印造、发行、收兑等业务收归官办,发行官交子。从交子始实行“界”的制度,每界一般三年,期满发行新纸币收兑旧纸币。官交子从天圣元年(1023年)至大观元年(1107年)共发行43界。“大观元年五月改交子务为钱引务”^[3],改发钱引,到南宋宝祐年间(1253~1255年)共发行了58界。宋代另一种主要纸币是会子,会子立界后从乾道五年(1169年)至嘉熙四年(1240年)共发行18界。宋代最后一种纸币是南宋末期的关子,于景定五年(1264年)发行,直至宋亡。宋代纸币发行时间,从北宋天圣元年正式设置“益州交子务”始至宋亡,逾250年。此外,宋代纸币种类繁多,有交子、钱引、会子、关子、小钞、公据、淮交、湖会等等名目,既有地方性纸币,又有全国性纸币。纸币面值也有大有小,如会子有一贯、二贯、三贯、二百文、三百文和五百文

[1]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瑛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瑛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戊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3] 《楮币谱》:大观元年五月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

六种。此外,宋代纸币实行“界”的制度,每界年限不等,一般二三年,也有十数年的。如交子有43界、钱引两轮共有58界、会子有18界,每界纸币都不一样。这就是说,同一种纸币往往有很多种版别。此外,宋代纸币发行量十分巨大,仅17、18界会子的发行量即达6.5亿贯^[1],根据各种文献的不完全统计^[2],宋代纸币发行量可能达数十至百亿张之多。

纸币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创举,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宋代纸币发明后,金、元、明、清历代沿用。元代以后,随着蒙古大军西进、中西方交流更加频繁,纸币开始传播四方、走向世界。1260年忽必烈汗(1215~1294年在世,1260~1294年在位)即位,命旭烈兀(1219~1265年)建立伊利汗国(1260~1353年),其地包括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旭烈兀的孙子乞合都汗(1240~1295年在世,1291~1295年在位)在位时,采取的一项重大经济举措就是在1294年仿照中国内地的元朝纸币制度发行纸币。伊利汗国发行的纸币,从印刷技术、纸币版式到发行管理制度,一概仿照元朝纸币。其纸币面值从半个迪拉姆(Dirham)到10第纳尔(Dinar)不等,纸币印有汉字、蒙古文和阿拉伯文^[3]。除了元朝伊利汗国仿照元朝内地纸币直接在西亚地区发行纸币外,元朝内地印刷的纸币也向西流传到俄罗斯等地^[4]。除此之外,元朝时东西方交通发达、交流频繁,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14~1270年在世,1226~1270年在位)派罗柏鲁(Guillaume de Rubruquis, 1215~1270年)访华,1253年到和林,朝觐蒙哥汗,1255年返回巴黎。罗柏鲁撰写有《东游记》(*Itinerarium ad Partes Orientales*)一书,其中介绍了元代印刷的纸币^[5]。1271年,马可·波罗(1254~1324年)来华,在元朝任职17年。1292年马可·波罗从泉州乘船回国,1299年口述写成《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书中详细介绍了元朝印刷的纸币^[6]。通过罗柏鲁、马可·波罗等人的描述,欧洲人对中国纸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拓宽了西方人的眼界。在东方,元朝时高丽为元朝属国,至迟在1276年

[1]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刘森:《宋金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叶世昌:《论会子》,安徽省钱币学会编《东至关子钞版暨两宋纸币》,黄山书社,2005年。

[2] 刘森:《宋金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

[3]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4] 《元史·英宗纪》:丙申,斡罗思(俄罗斯)等内附,赐钞万四千贯,遣还其部。

[5]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马可·波罗游记》九十五章“大汗发行的一种纸币通行于全国上下”。

高丽全境已流通元朝纸币。1280年元朝在高丽设征东行省,境内几十万大军的开支也用纸币。随着纸币需求剧增,元朝在高丽设宝钞提举司^{〔1〕}。明代以后,越南^{〔2〕}、高丽^{〔3〕}、日本^{〔4〕}等纷纷仿照中国印刷纸币。欧洲纸币出现很晚,直到1661年才由瑞典印刷发行。纸币从宋代发明后一直沿用,造福于世界人民,迄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尽管现代社会科技高度发达,但人们仍离不开纸币:无论身处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乡野,无论妇孺老幼,无论贫富……人们每天都跟纸币打交道,就像穿衣吃饭一样必不可少。虽然现在诸如电子货币、网上银行、信用卡等大量应用,但恐怕在我辈有生之年还不会看到纸币被完全取代。由是观之,中国宋代纸币是古今中外各种纸币的共同“祖先”,其影响无疑是世界性的。

显而易见,宋代纸币研究意义重大。若要系统研究宋代纸币印刷、发行、管理以及纸币印刷材料、印刷技术等一系列问题,最佳研究对象无疑是宋代纸币本身。如前文所述,宋代纸币种类繁多,印刷量极大,那么现在有没有宋代纸币存世呢?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迄今为止,在历次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物中均没有发现宋代纸币。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宋代纸币实行“界”的制度,期满发行新一界纸币回收旧纸币,收回的旧纸币为了防止舞弊,一般均要求焚毁,这是造成现在没有发现宋代纸币实物的最主要原因。刘森认为,“焚烧旧纸币,是为了防止按一定年限流通使用的纸币循环出入官库,以免造成新、旧币错出以致界分的混乱和伪造的滋生”^{〔5〕}。现存有元代“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图1)、“开元路退毁昏钞印”(图2)、“昏烂钞印”(图3)等实物可供参考。二是少数情况下,旧纸币回收后再制浆造纸,用以印刷新纸币。如乾道四年(1168年),急于印

〔1〕《高丽史·食货志》:(1287年4月)元遣使至高丽,诏颁至元宝钞,与中统钞通行。

〔2〕《大越史记全书·陈纪》:顺宗九年(1396年)夏四月,初行通宝会钞。其法十文幅面藻,三十文幅水波,一陌画云,二陌画龟,三陌画麟,五陌画凤,一缗画龙。伪造者死,田产没官。印成,令人换钱。

〔3〕《高丽史·食货志》:(恭让王三年、明洪武廿四年,1391年)七月,都有评议使司奏……吾东方之钱,如三韩重宝、东国通宝、东国重宝、海东重宝、东海通宝(东海为海东之误)载之于中传籍盖可考也。近古代又造银瓶为货,皆与布匹子母相权。后因法弊,铜钱、银瓶俱废不行,遂专用一综布为货。……银铜既非本国所产,钱瓶之货卒难复行,宜令有司参酌古今,依仿会子、宝钞之法,置高丽通行楮货,印法流布,与五综布相兼行使。

〔4〕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

〔5〕刘森:《宋金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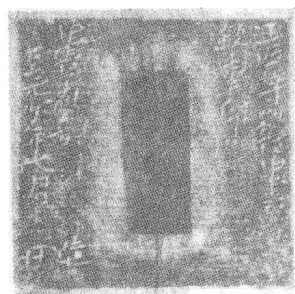


图 1 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



图 2 开元路退毁昏钞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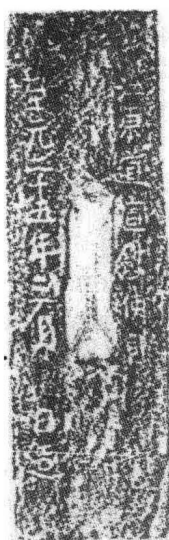


图 3-1 昏烂钞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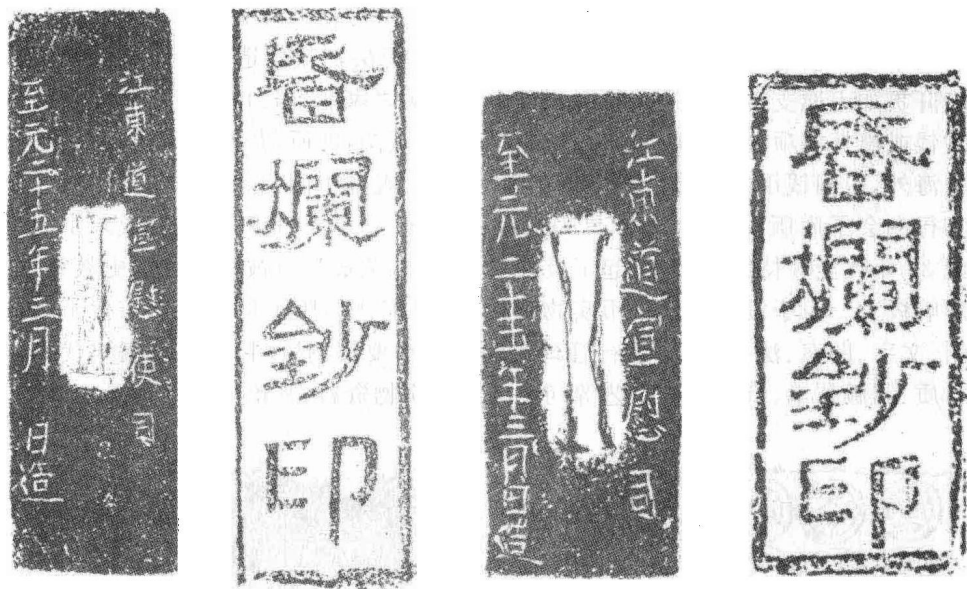


图 3-2 昏烂钞印

造新会子,但缺乏原料,令“以取到旧会毁抹截凿付会子局重造”^[1],即是一个特例。三是在于纸币本身,纸币的承印物纸张以有机质为主,不易保存。宋代纸币至今已历数百近千年,若未妥善保存,必定荡然无存、湮没于世。幸运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相继发现了两块宋代钞版。其中一块1933年前即流入日本,1938年日本学者奥平昌洪出版的《东亚钱志》一书收录了该版,称之为“会子铜版”(图4)^[2]。该版图文反文传形,分为三个模块,版首有5列10枚钱币图形,其下铭文为“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文流转行使”,最下层的图案有房屋、扛麻袋的人物以及“千斯仓”三字铭文。据此有学者将其简称为“千斯仓”版^[3]。1936年,又发现了“行在会子库”版(图5),最初发表于《泉币》杂志第九期,刊有张纲伯《行在会子考》一文及原大拓图^[4]。该版长17.4厘米,宽11.8厘米,图文也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中为“行在会子库”五个大

[1] 《文献通考·钱币考》:《乾道》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截凿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

[2] (日本)奥平昌洪:《东亚钱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3] 叶世昌:《〈宋史〉交子起源析误——兼论“千斯仓钞版”的产生时间》,《中国钱币》2002第1期。

[4] 张纲伯:《行在会子考》,《泉币》1941年第9期。